

“首届世界汉语教育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

朱 勇

“首届世界汉语教育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学会成立大会”于 2004 年 7 月 2—4 日在澳门理工学院隆重举行。作为首次就世界汉语教学史召开的专题研讨会,本次会议由澳门理工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共同举办。参加会议的共有来自德国、意大利、日本、韩国、俄罗斯、菲律宾、新西兰、挪威等国家以及中国大陆、澳门的代表 80 多人。

澳门社会文化司司长崔世安博士莅临本次会议并致开幕词,他代表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向与会专家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和问候并预祝大会圆满成功。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代表张西平教授、北京语言大学校长代表韩经太教授在开幕式上先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张西平教授指出,本次研讨会的召开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将推动我国对外汉语教学史的研究,将加深对汉语史和汉语本体研究的理解,将进一步推动海外汉学的研究,所以本次会议的召开也预示着一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的展开。

国家汉办主任严美华、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菲律宾华文教育中心主任颜长城等特向大会发来贺信,对这次会议的召开和学会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

大会共收到论文近 80 篇,主要涉及中国古代、现当代对外汉语教育史,近现代各国汉语教育史,东南亚各国华文教育史及 16—19 世纪西方来华传教士汉语研究等各个领域。下面从会议的特点及会议的主题两个角度分别阐述、评析。

一 会议的特点

1. 会议地址的特别性

在澳门召开世界汉语教育史议题的研讨会并决定设立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会,意义尤为重大和特殊。正如任继愈先生在致会议的贺词里所说:“澳门是历史上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是西方汉学的发源地,也是西方人最早学习汉语的地方。”澳门是明清之际西方人踏上中华大地最早的地方之一,耶稣会士更是把它作为向中国内地传播基督教的大本营。中国最早的一本《葡汉字典》就是由意大利籍耶稣会士罗明坚在澳门编写的,他还用拉丁字母编订了汉语拼音,其核心内容一直引用至今。第一本汉语语法书也是由来澳门的西班牙传教士万济国编写。而且外国人认识与学习汉语的史料在澳门也非常丰富,亟待中外学者的开发和研究。崔世安博士也指出,澳门是近代中国的对外窗口,是西方人自 15 世纪以来最早学习汉语的地方,亦是最早将汉语教育列入大学课程的地方,澳门历史上留下的有关汉语教育的丰富材料亟待我们开发和研究,因此,在澳门召开首届会议,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2. 代表的广泛性

参加本次会议的人员具有极大的广泛性，他们来自许多国家、多个单位和多种专业。本次会议的代表来自日本、韩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菲律宾、新西兰、挪威、保加利亚和中国（大陆及澳门）等 10 个国家。而且跟以往的对外汉语教学会议不同的是，本次会议的与会代表除了来自对外汉语教学单位，还来自外国语言系、历史研究所、华侨华人研究所、出版社、期刊编辑部，甚至法学院、哲学系等多个不同性质的单位。因为来自多个单位，专业背景也就不尽相同。本次会议的代表来自国内外汉学界、对外汉语教学界、历史界以及出版界等。

与会代表的广泛性，表明已有越来越多的来自不同国家、不同专业、不同学术单位的学者在关注世界汉语教育史领域。研究人员的广泛性是世界汉语教育史学科不断发展的一个有力保证，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预示着世界汉语教育史将呈现立体研究的局面。

二 会议的主题

会议采取大会主题发言和分组发言两种研讨方式。我们首先介绍一下大会主题发言的情况。主题发言由澳门理工学院宋柏年教授和日本关西大学内田庆市教授主持。中国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前副司长李海绩、菲律宾华教中心副主席黄端铭、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施光亨和北京大学教授严绍璗和澳门理工学院 IT 技术研究组先后发言。

李海绩指出对外汉语教学已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然而，他也指出，汉语在世界上仍然是弱势语言。作者坚信，汉语在可预见的时间内将发展成为一种强势语言。黄端铭明确指出现今菲律宾的华文教育必须定位于“华人的民族教育”。

黄端铭从 19 世纪 70 年代中期菲律宾的华文教育被“菲化”后华文学校面临的困境切入，明确指出现今的菲律宾的华文教育必须定位于“华人的民族教育”，其根本宗旨就是“培养具有中华文化气质而又能效忠自己国家的菲律宾公民”。确实，海外华人学汉语有其特殊性，华文教育定位问题也是一个敏感问题，可是这在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共存的国家无法回避，值得深思。

施光亨的发言题为《关于组织编辑“世界汉语教育史教材丛书”的建议》。施先生认为，资料是研究的基础。对跨越多个世纪，遍及东西方各大国的世界汉语教育史来说，资料工作尤为重要。他还深刻地指出，“一个学科，一项事业，如果他的历史是零零散散的，是断断续续的，那么它就是一种弱势的表现。如果整理出一个完整的历史面貌，它的作用不仅是呈现过去的辉煌，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历史的经验，它将增强队伍的事业心，加强我们的凝聚力，是鼓舞我们继续前进的精神财富。”

严绍璗以“原典实证”的方法，对 17 至 19 世纪日本人学习汉语白话的情况进行了研究。他基本上按时间顺序，从三个方面予以阐述：一、“唐通事”的发生、发展与汉语口语习学；二、黄檗宗的传人与汉语口语习学；三、“萱园学派”学者对汉文化的憧憬与汉语习学。其中，严先生对江户时代从事汉语口语翻译的专门人员——“唐通事”的研究尤为详尽，他们的身份、组织机构、人员名录、培养方法、所用教材、知识水平、具体翻译情况、同人结社以及他们对日本沿海各地乃至内地的影响等均有所论述。严先生的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示范性。

最后一个大会发言的是澳门理工学院的一个研究组，他们介绍了由董名垂等共同完

成的《汉语词汇 MFHZS 教学系统》。该系统是 IT 术在汉语教学中的具体应用,它把汉语词汇、拼音和声调结合在一起进行“捆绑”输入。研究的目的是避免教师在编写教材、出卷时要分开输入词语、语音、声调的繁琐。然而,有学者对该系统的作用表示怀疑。其中有学者提出演示输入“我出差差点出差错”等出现一字多音现象的句子,结果不太理想,看来该成果还有待完善。

大会主题发言之后是分组发言,下面根据发言情况,将会议的主题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并进行简要的评述。

1. 国别汉语教育史和汉学史

有关国别汉语教育史和汉学史的论文数量最多,共计 22 篇。涉及韩国、日本、越南、菲律宾、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西班牙、蒙古、法国、新加坡、瑞典、俄罗斯、新西兰等 13 个国家。论文的作者,既有从事汉语研究和教育的外国学者(如韩国的孟柱亿和越南的潘奇南)对本国汉语教育的考察,也有在该国长期学习、任教的中国学者(如北京外国语大学续三义、丁超)对所在国汉语教学情况的分析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张铠描述了西班牙汉学研究的发展历程。文章指出,地理大发现以后,西班牙为实现建立“东方天主教王国”的梦想,把中国的基督教化作为其奋斗的重要目标,并不断通过澳门或是菲律宾向中国派遣传教士。传教士们为了传教,首先要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字,进而需要了解中国的国情,由此则开始了西班牙的汉学研究。文章认为:一、西班牙的汉学研究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交流,从而加速了全球一体化进程,因此应当从东西方文化交流和全球一体化进程重要的视角来评价海外汉学研究的历史意义和在当代的作用;二、海外汉学发展的起伏可以视作为中华民族兴衰的晴雨表;三、透过海外汉学的研究,还向世人揭示出文明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的多元性和多样性,从而使世人能够乐观地展望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

关于法国,中国社会科学院耿升先对法兰西学院的筹建原因及背景作了介绍,接着指出,该学院是国外设立的第一个中国语言文学讲座。文章还对主持过该讲座的雷慕沙、儒莲、德理文、沙畹和马伯乐等的生平及成就逐一描述、评论。华东师大许光华则从师资队伍、办学方式、课程设置、教材编写和汉语研究等多个角度,对二战后法国汉语教学和研究进行了论述。

丁超对布加勒斯特大学汉语专业的培养模式、课程、教材、学生、师资、对外交流等基本情况进行了介绍。他指出,布大汉语专业对中国当今的社会、文学和文化发展,包括对外汉语教学的政策、成果和方法等问题的关注尚显不足。在对 HSK 的认识和推广方面,与其它国家还存在差距。保加利亚索菲亚大学董淑惠对保加利亚索菲亚大学的汉语教学情况进行了回顾。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朱德熙先生 1952 年至 1955 年在索非亚大学工作期间的情况作了介绍。作者认为朱先生有三大贡献:一、开办了保加利亚历史上第一个汉语讲习班;二、和张荪芬合编了保加利亚历史上第一部汉语教材《汉语教科书》;三、为保加利亚培养了第一批汉学家。不过,遗憾的是作者没有对《汉语教科书》的体例、内容等作具体的阐述和深入的分析。

关于日本汉语教育的文章较多。暨南大学鞠玉华指出,虽然日本大学生学习汉语的热情持续高涨,但学习效果并不明显。对此,作者从教材编写和教学方法两个方面提出了

建议。例,日本各出版社出版的教材种类很多,但不够系统,因此,各出版社应该协调编写系统性教材。北京语言大学钱婉约和华东师大王幼敏则从语言与政治的关系层面论述了近代日本中国语教育的历史特殊性及其发展道路的曲折性。

关于韩国汉语教育的文章最多。北京语言大学刘士勤介绍了该国汉语发展进程、课程设置、教材使用,还对韩国的中学汉语教学、社会汉语教学以及 HSK 情况作了详实的介绍和分析。北京外国语大学刘继红则描述分析了当代韩国汉语教育现状及启示。她认为要注意基础教学与专业教学相结合,应该发挥目的语环境的优势,为学生提供更多语言实践机会。

这些论文不仅描述了一些国家汉语教育的历史轨迹,而且从不同视角分析了汉语教育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的特点,有的还提出了对该国汉语教学发展的建议。这些都给与会代表很多启发。从这些论文我们发现,学者们对国别汉语教育的研究面正在扩大,不仅研究大学汉语教学,也把视角投向了广阔的中学汉语教学和社会汉语教学;不仅有经验性的描述,而且分析性成分也不断增加。不过,从提交论文所涉及的国别及大洲分布来看,论文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亚洲和欧洲,南美洲、北美洲、非洲等还少有问津。而且,很少有作者有意识地对国外的汉语教学和国内的对外汉语教学进行比较。总体上看,现有的国别汉语教育研究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还不够,有必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深入挖掘,争取能早日为国家推广汉语提供充分的决策依据。

2. 历史上的汉语学习教材和词典

为了学习汉语或者传授汉语,历史上的部分汉语学习者和教育者编写了一些汉语教材和汉语学习词典。这些教材和词典中蕴含了丰富的汉语语言学思想和汉语学习、教学思想,对这些历史材料的整理和分析无疑对今天全球范围内的汉语教育会有所启迪。令人欣喜的是,该类论文共 16 篇,占本次会议论文的五分之一强。

北京语言大学鲁健骥通过对一部 19 世纪中叶中国人编写的汉语简易读物《践约传》的介绍,再次呼吁对外汉语教学界重视泛读教学,继承“精读”和“泛读”并举的教学方法。联系到我们平日的对外汉语教学,鲁先生的担忧不无道理。光靠学习几本精读课本,留学生的语言输入量自然不足,语言输入量不足,培养留学生汉语语感只能停留在口号上。北京大学王若江对雷慕沙、儒莲等编写的《汉文启蒙》等法国 19 世纪中期汉语教材进行了分析,并归纳了法国汉语教材的传统。北京外国语大学柳若梅通过对在俄国深有影响的两部语法教材(《汉文启蒙》和《官话语法试编》)的对比,研究了它们在不同时期的意义。作者认为,它们是俄国汉语教学及研究史上最重要的两部著作,代表了俄国汉语教学史的不同阶段。两部语法书不仅带动了俄国汉语教育的发展,还反映出当时语言学成果对俄国汉语教育与研究的影响。

日本关西大学沈国威对英国传教士理雅各的《智环启蒙塾课初步》进行了分析。该书是为香港英华书院准备的初级英语教科书(刊行时间最迟为 1857 年),全书采用英中文对照形式。研究认为,该书的内容很丰富,全书共 24 篇,每一篇的主题各异,“几可称之为小型的百科全书”。该书的译词也很有特色,尽管理雅各新造的译词很少,能够留下的也不多。但是,“陪审”“银行”以及“热带、温带、寒带”等地理名词却是借助于《智环启蒙》而成为现代汉语词汇的。作者认为,关于该书译词的实际情况对现代汉语、日语的影

响,都需要我们再作深入的考察。

还有两篇文章研究了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的《汉英字典》。北京外国语大学杨慧玲认为,该字典作为世界上第一本汉英字典具有原创性,原创性体现在字典的检索方式和释义等方面。日本京都圣母院女子大学朱凤则研究了该字典中的成语和谚语。她认为,该字典的出版“不仅给学习中文的外国人带来了极大的方便,通过大量的日常用语及民间俗语的例句,还向他们展示了中文口语的诙谐和魅力。”

从上述来看,学者们对历史上的汉语教材和词典的研究视野趋于开阔,不仅研究传统的朝鲜半岛历史上的教材,而且开始重视西方的汉语教材和明清时期在华传教士所编写的教材、词典;以前的研究多从本体研究出发,此次会议有所不同,已逐渐开始梳理教材中的教学理念。比如北京外国语大学朱勇从万济国的代表作《华语言语法》入手,对其中蕴涵的汉语教学思想进行了细致的梳理,有描述、有分析,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但是,这一领域的研究还有诸多可深入挖掘的空间。首先,目前的研究多还处于零星状态,不够系统;其次,第一手研究资料匮乏。

3. 个人群体对汉语的学习与传播

世界汉语教育史也是个人或群体学习与传播汉语的历史。北京外国语大学张西平、张海英和暨南大学的叶农对明清时期来华的传教士罗明坚和利玛窦等的汉语学习和汉语教学活动进行了研究。张西平从罗明坚学习汉语入手,力图在一个具体的个案研究中再现早期入华传教士的汉语学习的真实情况。浙江大学董海樱对法国汉学家雷慕沙与19世纪早期欧洲汉语研究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该文分析了雷慕沙的突出贡献,认为《汉文启蒙》是对马若瑟《汉语札记》的扬弃,集19世纪前期西方汉语研究之大成。北京外国语大学续三义对日本已故著名汉语言学家香坂顺一的汉语教学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梳理。研究特别指出香坂先生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间仍孜孜不倦地为培养中日友好的接班人做了大量工作。香坂先生的事迹对中日两国的汉语工作者意义深远,值得学习。澳门教育暨青年局严娜对澳门土生葡人这一特殊的群体在具有双语双文化的背景下学习汉语语音、词汇、语法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对比他们与华人学习汉语的共性和差异,并提出相关的教学对策。

戈鲲化是我们今天所知来自中国本土的第一位任职于美国大学的中文教师。北京大学施正宇带着“是什么促成了他的破冰之旅?他为何愿意举家前往蛮夷之地?他在哈佛的教学情况如何?对后世有何影响?”等问题,以《戈鲲化哈佛之旅》为题予以了回答。研究认为,“戈鲲化能够出使哈佛,既是美国在华利益增长的迫切要求,也与当时美国社会对中国的认识有关;同时还与戈鲲化本人的生活经历、思想状况密切相关。”“他不仅是对外汉语教学事业上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开拓者,而且还以其亲身实践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汉语教学是美洲汉学的起点。”

上述论文,既有关于中国人如何传播汉语的,也有关于外国人如何学习汉语的,对这些个人或群体学习与传播汉语的行为的研究,无疑将丰富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

4. 外国人对中国语言文字的认识和贡献

外国人在学习和传播汉语的过程中,对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及汉语学习的难易度等也会从不同的视角有所思考。而且由于西方的语言学研究当时已经有了相对系统的科

学研究方法,所以他们多能借用西方语言研究方法来描述分析汉语,有些成果不乏理论创见,可以说,外国人对中国语言文字的认识、对于中国近代汉语史的研究是一个极具学术价值的文献资料库。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申等对耶稣会士安文思的《中国新史》中论述的中国语言文字观进行了综述。安文思认为中国语言比希腊、拉丁或其他欧洲语言都容易。因为“它既符合理性,又符合经验。”“中国语言是所有语言中最简明的……,而希腊语和拉丁语则有无数的词、时态、语态、数和人称等等。而中国语言只需用脑子记住用以区别词义形式的音调,并学会怎样读300多个单音节。”他还认为,“勤奋的人用好方法学习中国语言,可以在一年内学会,而且讲得很好。”他的某些观点也许值得商榷,但他将汉语与西方语言进行的比较,却科学地分析出了汉语的部分特点。

在耶稣会士传播西方文化的过程中,教士们不得不用汉语来解释一些外国词语和命名新事物。所以就创造了一些新的词汇,这对中国词汇的形成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意大利罗马大学保罗通过艾儒略的《职方外记》就其对汉语地名系统的贡献作了研究。日本早稻田大学千叶谦悟也研究了传教士的中文学习对中文词汇以及中文研究带来的影响。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明清时期汉语词汇的发展演变。

外研社叶向阳《17、18世纪来华英国人对中国语言文字的认识和评价》对当时来华英国人游记里的汉语论述做了全面的梳理,并在词汇、语音、语法等三个方向上对它们进行研究,同时引入同期英国的专著、译著和文学作品中的相关内容进行比较。作者认为,“如果从学术的角度去评判当时来华英国人对汉语的认识,并与当时及以后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学者的汉学研究成果相对照,这些早期来华英国人的论述大多不过是些印象记而已,显得粗浅,误读也多,属于初探性质。”

韩国外国语大学孟柱亿研究了2003年于韩国发现的一部英文版汉语语法书《中国北方口语语法研究》。该书作者 Mc Ilvaine, 1844年生于美国新泽西州, 是一位曾到济南传教的基督教士。孟柱亿认为,该书具有较强的实用性,这种“使学习者能够立刻学以致用”的做法,对今天的对外汉语教学以及语法教材编写仍有借鉴意义。该书注意到汉语类型上的特点,吸收了中国传统语言学的一些研究成果,注意到语体的差别以及汉语节律问题,描写官话的同时兼顾方言,这些都是比较可贵的地方。他还强调,该书在汉语口语语法研究史上,有而且也应当有一个较为重要的位置。

这几篇论文视角比较新颖,研究也非常缜密,向我们展开了一幅幅西方人眼中的中国语言文字画卷。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学者对这一崭新的领域开展更多的研究,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高质量的历史资料。

综合前面的四个主题,不难发现,本次会议论文的研究对象非常广泛。研究对象的广泛性决定了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因此语言学方法、历史学方法、宗教学方法、比较语言学方法在会议论文中均有所体现。

三 结 语

会议的最后,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交流学院张晓慧院长和北京语言大学崔永华教授在闭幕式上分别作了发言。张晓慧从宏观角度阐述了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

方法等问题。崔永华对大会做出总结:这次大会不仅议题好、文章好、会风好,而且会址也颇具历史和现实意义,“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学会”的成立使这项对学科发展具有标志意义的研究有了一个持久的论坛,使研究的拓展和深入有了组织保证。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逐步提高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汉语在国际社会中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全球范围内学习汉语的人数迅速增加,中国对外汉语教学规模也在迅速扩大,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对外汉语教学的不断深入发展。可是,长期以来,在对外汉语教育领域内,学术研究基本上以教学语法和教学法研究为中心,而缺乏学科史的研究。但是任何一个学科的发展都必须有理论根基和历史根基,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对外汉语教学领域自然也不例外。因此,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将拓宽这一领域,使汉语教育具有更为深厚和扎实的历史根基,为蓬勃发展的对外汉语教育提供更为坚实的基础和更多宝贵的经验。所以,加强世界汉语教学史的研究必将推动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的发展,促进各国汉语教育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和国外汉学史的研究。首届讨论会的成功举行,必定会对对外汉语教育史、海外汉学史、汉语本体研究等多个领域产生积极的影响。我们坚信,在第二届世界汉语教育史国际学术研讨会(2006年于日本关西大学)召开时,我们的学科将更加成熟,讨论的问题将更加深入。

(朱 勇 北京外国语大学)